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第 9 辑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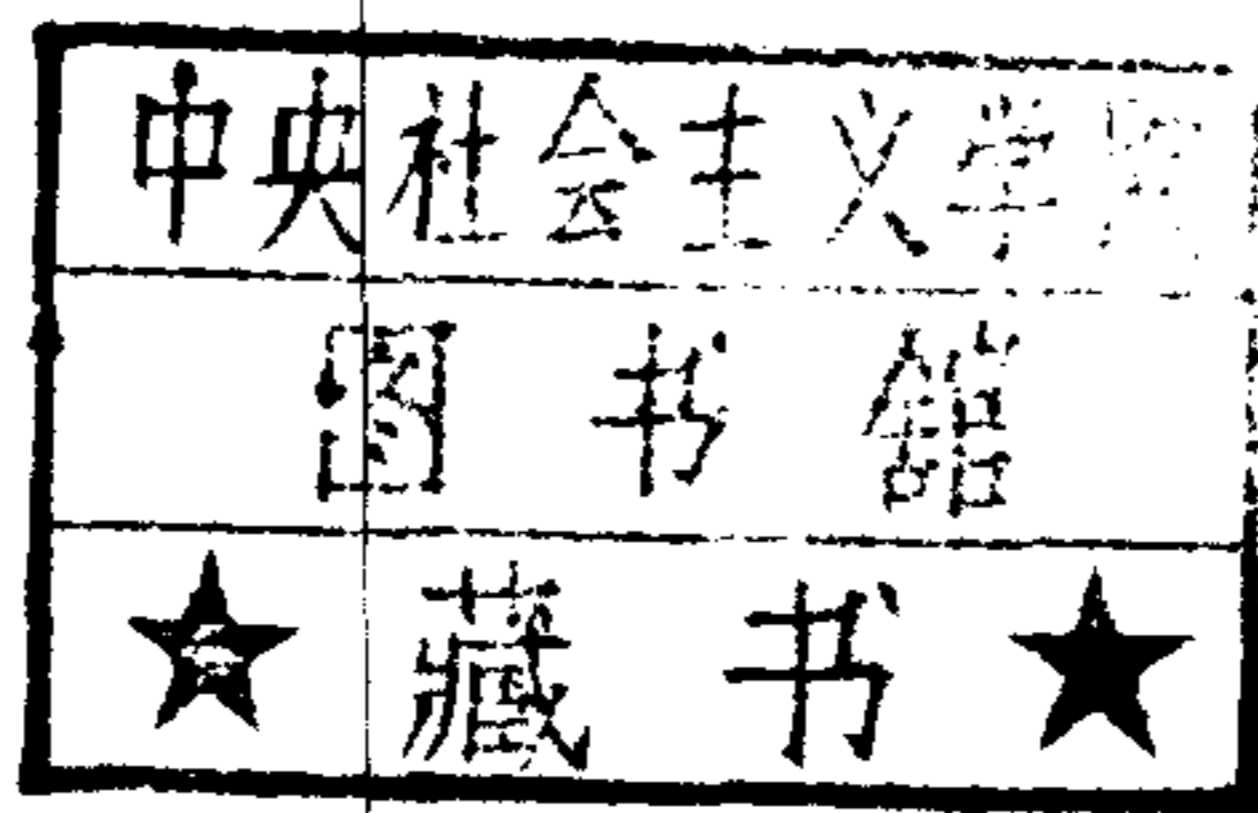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6072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九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江 枫
责任校对：黄庆华 曾学白
封面设计：王彦萍
版式设计：王丹丹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九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兵书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315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统一书号：11190·191 定价：2.55元

限国内发行

目 录

-
- (1) “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胡汉民 巴雷特
曾学白 译 江枫 校
- (41) 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 谢文孙
曾学白 译 江枫 校
- (84) 孔祥熙与上海金融资本家 科布尔
杨希孟 译 一叶 校
- (135) 赫尔利在中国 菲 斯
林海 译
- (182) 清末四川的半殖民地化与仇教运动 铁山博
施超伦 译
- (216)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与
中国革命 冈田英弘
赵长碧 译
- (237) 关于皖南事变 白修德
金坚范 译
- (24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1926—1927) 诺 思
江枫 译
- (295) 湖北的农民运动 鲍罗廷
李玉贞 译
- (302) 冀东走私的兴衰 中村隆英
李秀石 译

“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胡汉民

1922—1927年

巴雷特 (David P. Barrett)

国共1922—1927年政治联合的经历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以后的发展道路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已经被称为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虽然事实上这个名词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无保留地使用的，因为当初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讲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而国民党及其言之有据的革命历史却始终不变地使用“容共”一词，以表示是国民党开门让一个在地位上显然低于自己的小党派的成员加入党。共产党使用的这个名称在以后的年代里为许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所采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学术界对共产党在二十年代这关键性的几年中的发展所给予的重视。然而，即使为了方便而保留“统一战线”一词作为1922—1927年这一时期的总标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国民党凭它本身的资格同样应该受到仔细详尽的研究，这样才可能更全面地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之所以要强调是由于诸如“左派”、“右派”之类常常被用于国民党的范畴，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有价值，但总的来说混淆或歪曲了国民党内对共产党人加入这一问题的范围极广各不相同的看法。直到1927年清党发生为止，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以多变为其特点的。

著名的国民党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胡汉民（1879—1936）的经历充分说明统一战线时期的这种复杂性质。胡汉民效力国民党的时间很长，可以追溯到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创立时

期。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胡或许是孙最亲密的顾问，在孙中山几次短暂的执政时期里担任过许多职务，孙中山失势时在他的相继成立的革命政党中担任他的主要助手。由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处于那么高的地位，又参与了那么多关键性的决断，因而他在第一次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最初胡汉民支持与共产党和苏联合作，主要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使国民党恢复生气。他对这项政策感到幻想破灭是一个缓慢却又不可逆转的过程，主要渊源于他日益增强的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威胁了中国的独立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我们不可能确定哪一个明确的事件或时间是胡汉民态度的转折点。不过很明显，他作为国民党的特使于1925—1926年冬季在苏联渡过的那几个月，可以认为是这种转变的最后阶段，因为他一回到中国就开始提出结束国民党与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但是必须强调，胡汉民立场的演变是逐步的。胡的政治经历反映了深入于国共关系之中的紧张状况，因此，胡的政治经历对于研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复杂的也是划时代的种种事件是给人以启发的指南。(1)

国共合作的建立

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政治安排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它适合共产国际和孙中山双方面的需要。导致这一创举的谈判引起了许多学术争论，其部分原因是这段记载有许多令人烦恼的空白。我想在进入正文以前，先就这一时期允许的范围对共产党

(1) 对于胡汉民的政治著作，笔者在博士论文《胡汉民思想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伦敦大学，1978年）中有所论述。胡汉民一生的主要经历在包华德（Howard Boorman）和克拉克（Richard C. Clark）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二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中有详细的叙述。肯尼迪（Melville T. Kennedy）的《胡汉民的经历与思想》一文对胡汉民的一生做了简短介绍，并对胡汉民解释孙中山主义的一些文章进行了研究，文载薛君度所编《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人物》（纽约，1971年）一书，第271—294页。

和国民党的立场做一个最简短的概述。

首先，从共产党方面，共产国际代表（以化名马林而为人熟知的）斯内夫利特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1921年12月，马林在桂林孙中山的军事大本营与孙接触。马林可能曾向孙建议他的党需要改组，还可能提出过国民党与共产党实行某种合作。显然孙对苏联所表现的兴趣，和他的多少有点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给马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¹⁾ 由于马林对孙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之适合感到满意，接下去他就必须说服中国共产党申请个人加入国民党，在其内部以集团的形式去工作，几年以前他在荷属东印度时就已发明了这种策略，以促使共产主义者参加一个庞大但是组织松散的民族运动——伊斯兰教联盟。尽管马林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样一种安排中不会丧失独立，但是在1922年4月中共中央杭州全会上他却未能在争论中取胜。⁽²⁾ 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信中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陈写道，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赞成”它的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两个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³⁾ 马林并未气馁，他接着又从莫斯科寻求对于他那内部集团建议的支

(1) 宾 (Dov Bing)：《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载《中国季刊》4期（1971年12月），第677—697页，特别是第677—679页。关于孙中山接见马林的进一步背景见韦慕庭 (C. Martin Wilbur) 《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18—121页。

(2) 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第683—684页。并见有伊罗生 (Harold R. Isaacs) 导言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文件》，载《中国季刊》，45期（1971年3月），关于马林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其建议的立场所作的轻描淡写的陈述。可参阅第一篇《与斯内夫利特一次谈话的摘记：关于1920—1923年的中国问题》，第100—109页，特别是第103—104页。蒙捷沃夫 (A.C. Muntjewerf) 已对宾有关举行过一次杭州全会的断言提出质疑，见《是否有一个斯内夫利特战略？》，载《中国季刊》53期（1973年3月），第159—168页。并见宾的答复，载《中国季刊》54期（1973年6月），第345—354页。

(3) 格鲁宁 (V.I. Glunin)：《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立》，载捷柳辛 (L.P. Delyusin) 等合编的《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第242—299页，第252页。陈独秀的信所注日期为1922年4月6日。

持。这时，据宾说，共产国际批准了马林的计划，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与他保持“密切联系”。⁽¹⁾在1922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杭州全会上，与会者对于内部集团建议又一次表示出不同程度的反对，但是列宁主义的纪律生效了，马林的政策终于被接受。⁽²⁾于是共产党这时便奉行这样一项政策：在其成员申请加入国民党的同时，努力维护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并且发展党员、扩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采取这项政策适逢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命运急转直下。6月16日，广东实力最强的军阀陈炯明反叛孙中山并把他赶出了他的首都广州。到8月中旬孙启程前往上海，在那里形形色色的使者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他进行接触。据陈独秀1929年的记述，苏联青年团代表达林（Sergei Dalin）曾向孙建议两党联合，但是孙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不过他指出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³⁾达林本人的极其详尽的回忆录引起了人们对这一建议的怀疑，因为它没有提及达林方面的这种主动。⁽⁴⁾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孙中山不准备与一个比他的党小得多，而又几乎不能控制其成员的党合作。因此，当马林提出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时，孙表示赞同，然而孙的热情毫无疑问是由于这种安排可以提供获得苏联援助和支持的途径而激发出来的。⁽⁵⁾孙一批准马林的建议，陈独秀和著名中共理论家李大钊便参加了国民党。孙还同意对他的党进行改组。为此，孙中山于9月4日—6日在上海召集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又选出了

(1) 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第687—689页。

(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载《中国史研究》，第3卷，第3期（1970年春），第224—250、226—227页。又见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1921—1927）》（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53页。

(3)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26页。

(4)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莫斯科，1915年），第108—130页，关于达林与孙的会晤。

(5) 《国父年谱》（台北，1965年），下册，第853页。书上说孙“许”马林建议，没有提出孙是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计划的发明者。

一个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起草委员会，草拟国民党改组所需要的各种文件。(1)

正是从这个时候，胡汉民才开始直接卷入国共之间的新关系。在这次会议之前，胡汉民曾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同共产党代表的讨论就不得而知了。1921年12月，当马林初次与孙中山会晤时，胡在桂林孙中山的军事大本营中任文官长和政务处长。(2) 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胡汉民有可能会见过马林，或者与孙中山讨论过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到1922年9月(这时的记载越来越充实)，胡支持这种新方针是很明显的。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在此后的一份共产党资料《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中得到了证实。这份资料似乎写于1926年9月，胡对共产党的反对已开始为人所知，至少在政界上层已经为人所知之后。(3) 据这份文件称，孙“立即”接受了向他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建议，在做出这项决定的过程中，“他在上海得到了国民党最重要的成员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和其他人的坚定支持”。仿佛为了强调胡汉民对这一政策的赞成，这份文件接着指出，由于国民党的虚弱，“甚至像胡汉民这类从未声称信仰左派学说的人也赞同孙的决定”。(4)

国民党改组一经决定，胡汉民所承担的第一项任务是起草一份党的宣言和临时党章，这和他在党内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经历相称。11月15日他和汪精卫被指定从事这项工作。(5) 宣言于1923年1月1日发表，党章草案也于次日发表。宣言开首扼要叙述了国民党的历史，接着提出了孙中山设计的把政府分为五个相互平

(1) 《国父年谱》，下册，第853—854页。

(2)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以下简称蒋：《年谱》)(台北，1978年)，第263页。

(3) 韦慕庭和夏连荫(Julie L.How)：《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件汇编(1920—192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文件1《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第41—78页。这篇文章可能是维经斯基根据李大钊提供的材料撰写的。第38—40页，第490页注⑧。

(4) 同上，第61—62页。当时汪精卫实际上反对允许共产党人加入。

(5) 蒋：《年谱》，第274页。蒋说，胡之所以当选是由于他“熟悉党内历史”。

衡的部分的方案——五权宪法的纲要。(1) 强调了三民主义的首要地位，并对孙中山的社会改革计划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平均地权”和政府对自然资源专利的管理这些从同盟会时期就有的政策也得到了强调。还有一系列温和的社会、经济措施，所有这些在一旦获得政权之后即由党颁布执行；没有提号召群众主动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

党章草案是宣言的补充。它勾划出国民党新的管理机构的轮廓：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国家一级的各种委员会、省和地方一级的党部网，和约束党员的纪律措施。在这个结构的最顶端是总理，他有权“代表党”并“总揽党务”。各咨询班子须由总理任命，被任命者成为党内各委员会的负责人。(2) 宣言和党章放在一起看是一种奇妙的杂交型的创造：社会计划是改良主义的；委员会结构是列宁主义的；给领袖，也就是孙中山，保留的那些权力至少就其潜在涵义而论是专制主义的。但是这些文件，特别是党章草案，表明国民党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其中阐明的原则形成了一年以后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的更为详尽的宣言和党章的基础。(3)

胡汉民有一篇值得注意的回忆录，它进一步证实了胡对国民党转向新方针的赞同。在几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胡提到1923年1月孙越宣言签订后不久，孙中山、廖仲恺、汪精卫和他进行过一次讨论。(4) 孙中山向他的三个最亲密的伙伴征求对新近采取的对

(1) 《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1955年）第1044—1049页。这份宣言被翻译收载谢然之（Milton J.T. Shieh）编《国民党：历史文件选（1894—1969）》（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65—70页。

(2) 《革命文献》，第8辑，第1049—1052页。第4—6、10、17条详细说明了总理的权力。

(3) 很可能胡汉民对党的组织问题的兴趣使他成了1923年党章的主要起草人。

(4) 胡汉民：《革命与反革命之显著的一幕》，载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3卷（台北，1961年），第393—402；394—395页。这篇讲话发表于1929年。关于越飞与孙的会晤，以及协议的文本见韦慕庭：《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第135—140页。在那份协议里，越飞向孙许诺苏联将给予援助，同时宣布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

共产党和苏联的政策的想法。廖仲恺热烈赞成这些政策，他指出，除了苏联，中国在国际上失去了朋友，他认为苏联提议援助是诚心诚意的。汪精卫代表另一个极端，他坚持认为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加入可能招来致命的危险。胡汉民说他的主张介于两者之间。他所举的理由值得注意。首先，他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的社会问题更趋严重。而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学说又为党的许多成员所忽视，因此，应该容许那些对社会问题怀有马克思主义式的关切的人加入国民党，只要他们诚心与党合作。

胡汉民提出的支持这项新政策的第二个理由是以前国民党在吸收具有无政府主义哲学思想的人方面的成功。这些人自忠于三民主义以来没有造成问题；因此可以对共产党抱同样的期望。胡汉民说他曾对共产党感到有些不安，因为允许另一个有组织的党的成员加入使他想起1912年国民党与几个小党派合并给党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¹⁾那时的作法使腐败投机分子混入国民党，党在那时没有办法对付这种有害的影响。胡的观点是，只要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信仰党的主义，努力于国民革命，就应该受到欢迎，如果他们从事危害国民党之类的外部活动，就应该被淘汰。胡汉民说孙中山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孙补充了如下说明，他对国民党要有自信的说法令人心服：“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使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不怕的。”⁽²⁾

尽管改进的文件发表了，但在19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似乎进展缓慢。孙中山在集合于他的旗帜之下的军阀夺取广州之后，于2月返回广州。不久以后，孙把注意力转到了在广东北部建立一支军队上，他希望从那里发动一场军事讨伐，打入湖南和更远的地方。直到10月初，随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特

(1) 1912年改组的失败是胡汉民政治著作中经常谈及的题目，这次改组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公开党。

(2) 胡：《革命与反革命之显著的一幕》，第395页。

使鲍罗廷的到达，国民党领导人的兴趣才回到了党的重建上。鲍罗廷到达后不久孙就与他进行了多次讨论，其成果之一是建立了一个国民党九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¹⁾胡汉民被指定进入这个重要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为预定于1924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鲍罗廷被指定为执行委员会的顾问。

鲍罗廷认为，国民党改组的含义远不止于建立一个新的管理机构。从他到达之时起，他就强调为党建立群众性基础的必要。这只有通过代表城市工人，特别是大多数极端需要土地的农民的利益的激进政策的促进才能做到。正是在土地政策问题上，鲍罗廷和国民党领导人发生了第一次冲突，那是在11月13日由临时中执委主持的国民党广州地区区党部会议上。⁽²⁾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录，鲍罗廷提议国民党政府没收广东地主的所有土地“以利于实际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与会的国民党成员对这项建议的反应是赞许的。⁽³⁾但是，国民党很快就取消了这项没收土地的计划。孙中山通知鲍罗廷，他不愿支持重新分配土地的法令。孙中山建议与农民“建立联系”弄清他们的需要。⁽⁴⁾

为使国民党相信他的激进的土地纲领，鲍罗廷又做了进一步的尝试。这件事发生在1924年1月中旬临时中执委最后几次会议中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和鲍罗廷组成的非正式的“四人委员会”召开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宣

(1) 《国父年谱》下册，第963页。

(2) 在土地政策上的这些意见分歧异常清晰地表明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根本界限。只是由于重要的苏联资料，特别是切列潘诺夫(A.I.Cherepanov)的《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莫斯科，1934年)的发表，这些争论才得到了应有的讨论。霍鲁布尼奇(Lydia Holubnychy)在《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安阿伯大学，缩微胶卷，1979年)一书的第293—340页对此做了详细论述。

(3) 切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8—40页。切列潘诺夫广泛利用了鲍罗廷的报告。

(4) 同上，第43页。

言最后定稿。在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胡汉民强烈反对鲍罗廷的重新分配土地纲领，指责这种纲领只是故意要在农民中引起混乱。胡汉民还反对鲍罗廷把广州的大公司资产收归国有的计划。(1) 汪精卫更进一步：他甚至反对党以答应支持工人和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要求来换取他们对党的支持。(2) 鲍罗廷由于未能在委员会中取得进展——他把这归咎于他所谓的他的同事们“思想上的混乱”——便直接求助于孙中山。(3) 孙中山当时作何答复不得而知。然而，由于党内保守分子所施加的压力，和孙中山本人赞成缓慢的有秩序的改革的天性所起的作用，过不多久就可以看出，鲍罗廷的努力失败了。在提交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并没有包含由他提出的有选择的没收土地的条款。(4)

与在社会政策上的分歧形成对照的是，有关于党的行政机构改组问题的讨论倒进行得比较和谐。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进行的，胡汉民、廖仲恺和鲍罗廷曾于12月间临时调往该委员会。胡在委员会的一次讲话表明他强烈赞成改组，鲍罗廷记录了他的部分讲话：(5)

现在，中山先生一人为我党主义而斗争，而国民党党员未能支持他，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每一个人加入国民党时，都准备为党而工作，但是党组织得不好，而新党员则不知道应该从何做起，做些什么。即使他们想要支持党，他们也没有机会这样做。此外，一般来讲我党从前一向未有政治路线；因此，不可能有共同的行动。国民党迄今未能为自己的主义而斗争。

(1)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第265页；蒋：《年谱》，第295页。

(2) 卡尔图诺娃 (A.I. Kartunova)：《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诸问题》，载捷柳辛：《共产国际与东方》，第300—312，310页。

(3) 切列潘诺夫：《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57—58页。

(4) 同上，第68—69页。

(5) 同上，第50—51页。

切列潘诺夫是在大约四十年以后撰写他的回忆录的，他把胡汉民和汪精卫说成是“政治冒险家和两面派”，但是他不能不承认他们“基本上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¹⁾因此，对于鲍罗廷加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思想混乱”的责难必须细心琢磨。鲍罗廷十分正确地察觉到他们对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重重忧虑，他把这称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小资产阶级态度”。⁽²⁾但是他严重误解了胡汉民、廖仲恺这些人的政治直觉，即使他了解他们对党的改组负有责任，或者说他们对自己在政府领导的社会改革问题上的看法负有责任。

宣言草案的完成标志着临时委员会工作的结束。在这个时刻概括一下胡汉民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对国民党政策中的新转折的态度是有益的。首先，他支持国民党改组，因为他长期以来就对孙中山领导的早期党派的弱点有所认识。其次，与苏联联合在人力和物力方面都对孙中山的政府有好处。胡汉民对中国共产党持何种态度不太清楚，这主要因为当时他在很高的级别上从事政治工作，处在那样一个级别，他和他的同事们更多的是与鲍罗廷接触，而不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接触。胡汉民那时对鲍罗廷作何评价也很难判断，因为后期成为两人关系特点的敌视往往被硬加给了早期。胡汉民和鲍罗廷之间很快发展成为敌对不出人意料，因为他们俩人都有极强的个性，而且在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改革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有着显然不同的思想主张。也有可能胡汉民和党内其他人对鲍罗廷的态度充满了个人的不满成分，因为鲍罗廷一下子便成了孙中山志同道合的顾问小圈子里的成员，而且，更有甚者，他当时还有接近孙本人的特殊权利。在这样高的级别，个人不和和政策分歧的相互影响是很难分辨的。

完全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不管胡汉民对鲍罗廷有什么保留，与胡汉民对国民党改组和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支持相比

(1) 同上，第50页。

(2) 卡尔图诺娃：《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诸问题》，第310页。

都是无关紧要的。他被中国共产党看作“中派”。⁽¹⁾ 这是在以国民党元老邓泽如为首的反共“右派”已经分化出来时的看法。⁽²⁾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紧接而来的政治工作中，胡汉民显示出了这种中派立场。

改组：国共紧张关系的出现

当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指定胡汉民为临时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负责指导大会程序。胡汉民、汪精卫一年前起草的宣言草案和党章所包含的绝大多数建议均为代表大会所保留。⁽³⁾ 孙被特别指定为总理，党员必须承认他在一切事务上的权威。他有权任命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执委会；他还对这个委员会，以及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所有提议拥有最后决定权。⁽⁴⁾ 于是1923年改组计划的特征重新出现在1924年的党章中：凌驾于列宁主义的由一直延伸到群众的各级分支委员会组成的结构之上有一个独裁的总指挥，他有权否决党的下级机构的任何主动精神表现。孙本人的进步倾向帮助抵销了授予他的那种权力的有害的可能性；尽管国民党经历了重大的组织变革，却仍然不能说它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形成为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结构。⁽⁵⁾

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前，反对共产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的情绪

(1) 力士：《国民党清党以前的左派组织》，载《现代史料》（上海，1934年）第1卷，第86—90；87页。

(2) 韦慕庭：《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第180—182页。

(3) 宣言见《革命文献》第8辑，第1125—1136页。译文载谢然之：《国民党：历史文件选》，第75—85页。党章见《革命文献》，第8辑，第1136—1148页。

(4) 《革命文献》，第8辑，第1138—1139页。第4章，第19、20、23条款详细说明了这些权力。

(5) 雪莉（James R. Shirley）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的控制》一文中强调了这一点，文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第1期（1965年11月），第69—82；71—73页。

高涨起来。当党章付诸讨论时，一名代表提出一项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动议。这项动议如果通过，孙中山就将面临一个要求：共产党员要想加入国民党就得与他们自己的党脱离关系。⁽¹⁾在答复这个问题时，李大钊强调，他和他的同事们是以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个别成员的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唯一的目的是促进国民革命；他们不构成一个实现其自身政治和社会纲领的集团。李的保证未能说服一部分国民党代表，他们要求制订专门措施监督共产党员。胡汉民是发言反对这项动议的几个国民党高级人物之一。胡汉民强调制订党章正是为了处理所有有关纪律的问题，他反驳说，任何问题出现都可以在现有的规章制度中得到解决。⁽²⁾这项动议付诸表决时，遭到了决定性的否决。胡汉民对这个问题的阐述被接受了，引起争议的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党员资格问题暂时被埋葬了。

胡汉民认为，第一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国民党在组织上的重新缔造。在这方面，民主集中制的观念对胡汉民很有吸引力，他认为这是解决困扰着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组织混乱问题的答案。胡汉民用与他前一个月在上海的讲话相似的语言向代表大会讲了这项原则对党的重要性：⁽³⁾

虽然吾党欲达国民革命之目的，成群众之政党，则亦不能全赖此等党员个人之自律精神；革命的群众政党，须有普及的强迫的纪律……若无民主集权制之组织及纪律，则必不能胜利。无组织之政党，等于无政府主义者之俱乐部，决非民众之先锋队，决不能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1)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71年），第41—43页（会议12，1924年1月28日）。

(2) 同上，第43页。胡是这次会议的主席。

(3) 同上，第21—22页（会议6，1924年1月22日）。